

## 蚕文化中蕴含的生态伦理观

顾一平

(云南民族大学人文学院, 云南 昆明 650500)

**摘要:**从生态伦理学的视角切入,通过对蚕文化不同时期中蕴含的生态伦理观的分析,指出现阶段蚕文化中蕴含着良好的“人类中心主义”的生态伦理观。该伦理观中包含着人类敬畏自然、利用自然、良性改造自然的生态伦理观念。人与自然的关系既是生态伦理观的核心,也是生态文明的基本内涵之一,提倡现阶段蚕文化中蕴含的良好生态伦理观,有助于推进我国生态文明建设。

**关键词:**蚕文化;生态伦理观;生态文明建设

**中图分类号:**G1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7798(2018)05-0026-06

### Ecological Ethics Concept Contained in Silkworm Culture

GU Yi-ping

(Faculty of Humanities, Yunnan Minzu University, Kunming, Yunnan, 650500)

**Abstrac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ecological ethics, and through the analysis of ecological ethics concept contained in different periods of silkworm culture, this paper points out that there is a good "anthropocentrism" ecological ethics concept in the silkworm culture at the present stage. This concept contains the ecological ethic concept in which humans respect nature, use nature, and beautify natur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man and nature is not only the core of ecological ethics concept, but also one of the basic connotations of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Advocating the good ecological ethics concept in the present stage of silkworm culture will help promote the construction of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in China.

**Key words:** Silkworm Culture; Ecological Ethics Concept;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Construction

生态伦理观,是指人类对自身在自然界中的地位和与自然关系的认识观念。生态伦理的确立,规范着人类的思想和行为,影响着人类赖以生存的生态环境,是关系到人类生存和社会发展的重要观念<sup>[1]</sup>。在我国,党的十八大提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由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四位一体”拓展为包括生态文明建设的“五位一体”。习近平总书记继承这一总体布局,在十九大报告中再次强调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性,可见,我国已充分意识到建

设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性。

生态文明建设,有助于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处。而人与自然的关系既是生态伦理观的核心,也是生态文明的基本内涵之一。因此,良好的生态伦理观,也能够引导生态文明的建设,最终有助于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处。这是观念和行为相互建构的结果。本文则侧重于分析观念对行为的规范作用,即强调良好的生态伦理观对生态文明建设的积极作用。

良好的生态伦理观,表达出人对自然生态环

收稿日期:2018-04-10

作者简介:顾一平(1994-),女,浙江桐乡人,云南民族大学人文学院2017级社会学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性别社会学。

境友好的,至少是较低威胁的态度。在此生态伦理观下产生的行动,不会对自然生态环境造成难以补救的伤害。如此生态伦理观可以在农耕文化中寻找,因为农耕文化就是依靠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来存续的。而蚕文化作为中国优秀的农耕文化之一,蕴含其中的生态伦理观念随其发展而不断变化,呈现出多样的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关系。这些生态伦理观的传承,便形成了现代良好生态伦理观的孕育之所。由此,本文从生态伦理学的视角切入,在对蚕文化产生和发展各个时期中蕴含的生态伦理观进行分析的基础上,提炼出适合引导我国当前生态文明建设的良好生态伦理观。

## 一、问题的提出

农耕文化是人类利用自然资源创造出来的物质和精神财富,其中包含着大量人与自然的关系。或许现在随着科技的发展,农业的风险控制越来越强,但是农民与自然的关系依然是强关系。如果农民不处理好自身与自然的关系,就不会有好的收成。因此,古老农耕文化中的生态伦理观,理应是一种良好的生态伦理观。否则,极其依赖于自然条件的农耕文化就会难以承继。

蚕文化作为重要的农耕文化之一,在我国有着漫长的历史,并且在许多地方保存有完整的文化形态,对于蕴含其中的生态伦理观有很大的发掘价值。蚕文化不是一成不变的,随着蚕文化的发展,蕴含其中的生态伦理观也随之改变。所以,需要通过对蚕文化各个时期具体文化形态的分析,来探讨蕴含其中的生态伦理观的变化。并在此基础上,找出蚕文化中与生态文明建设相契合的生态伦理观。由此,本文集中探讨两个问题:一是,探讨随着蚕文化的发展,蕴含其中的生态伦理观出现的变化;二是,探讨从蚕文化中,我们可以汲取的良好生态伦理观的主要内涵。探讨问题的依据资料,则主要是相关的文献资料。

## 二、蚕文化的源起及内涵

蚕文化是我国农耕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如今呈现在世人面前的,则是经过上千年发展而形成的蚕文化形态。探索蚕文化的源起,以及其后的发展,是从历史维度来了解蚕文化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方法。虽然蚕文化的内涵会随着蚕文化的发展而发生变化,但是学者们还是概括出了一个比较全面的蚕文化内涵。

### (一) 蚕文化的产生及发展

以出土的丝绸文物为证据,中国的蚕业起源于至少 5000 年以前,甚至在 7000 年左右<sup>[2]</sup>。有的学者便将蚕文化起源至今这一漫长的历史,人为地、粗略地划分成了如下几个时期。

萌芽期,指史前的氏族社会时期。这个时期,原始的野蚕被驯化为家蚕,人类开始利用蚕丝,具备了蚕文化的基本特征和形态结构。

生长期,指夏、商、周时期。随着中国农业文明社会的开始,商代出现了与蚕相关的记载,养蚕、丝织技术水平也变得相对高超。周代则不仅增添了蚕文化的史书记载,还扩展了丝绸产品的类别,并且是我国官营丝绸生产和管理机构的开端。

鼎盛期,指秦、汉、晋、隋、唐时期。蚕丝业的兴起促成了“丝绸之路”的开辟,“丝绸之路”又继续推进蚕业的繁荣。晋朝的内乱引发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的人口南迁,促进了江南蚕丝业的发展。唐朝是中国蚕文化鼎盛时期,文献记载形式丰富多样,“安史之乱”引起的第二次人口南迁,再次刺激江南蚕丝业的发展。

变迁期,指宋、元、明、清时期。宋朝南迁导致了中原蚕文化的衰弱,虽然明朝的蚕文化在江南地区得以繁荣,但是到了清朝,由于受到西方列强和日本的侵略,蚕丝业遭受严重打击。而后,直到新中国成立才得以重振<sup>[3]</sup>。

纵观这些历史时期,缺少对现阶段蚕文化的研究。进入新的历史改革期,蚕丝业的改革,蚕文化的丰富值得关注。

### (二) 蚕文化的内涵

蚕文化,是指从事与蚕相关产业的民众对社会生活的经验性总结和提炼。蚕文化事项与一定地域内的生产、生活方式紧密联系,并与一定区域内的民风、民俗融合互动,逐步演变为我国独具特色的一种传统文化。蚕文化表现在物质、制度和精神三个层面:物质层面的蚕文化主要包括桑树、桑叶、蚕茧、生丝、生产技艺、丝绸工艺品等;制度层面的蚕文化是建立在物化基础上的宗法等级制度,蚕文化衍生的丝绸服饰是“分尊卑、别贵贱”的礼仪制度工具之一,丝绸服饰的高贵与华美,往往与地位、权力结合在一起;精神层面的蚕文化是在中国特有的宗教观、美学观、价值观、经济观、外交观、道德观等影响下形成的,包括许多神话故事、民间传说、民间风俗等<sup>[4]</sup>。可见,蚕文化的物



质层面是由其物质文化形态表现出来的,而制度层面和精神层面则是由其非物质文化形态表现出来。其中,蚕文化制度层面的表现虽然建立在物化基础之上,但是其本质还是封建等级观念。且这种等级不是通过服饰等物质本身体现出来,而是通过服饰等的高贵华美与否体现出来,与物质文化还是有一定区别。因此,笔者在这里将其划入非物质文化部分。

其他学者对于蚕文化的内涵表述略有区别,但其共同的一点就是,蚕文化是集物质文化与非物质文化于一体的。

### 三、蚕文化中的生态伦理观

蚕文化是中华民族优秀农耕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且经过数千年的历史传承,至今已然成为文化传承的重要载体,成为举世瞩目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值得我们发掘蕴含其中的人与自然之间的生态伦理。

在现代社会中,要从一种传统文化中汲取养分,纵向的历史分析不可或缺。只有回到一种文化的产生及发展过程当中,才能更好地理解一种文化的形成缘由,以及蕴含其中的生态伦理观的演变。

#### (一) 蚕文化萌芽时期中的生态伦理观

萌芽时期,蚕文化的痕迹一般留在含有蚕元素的器物上。比如,大量新石器时代遗址出土的绢丝制品、绘有蚕纹的黑陶罐、刻着四条蚕纹的象牙骨盅、残陶上蚕幼虫啃叶的逼真图纹、与纺织有关的简单磨制工具等<sup>[9]</sup>。这些出土文物中的代表性器物,表现出了物质层面的蚕文化。

萌芽时期的人类虽然还没有发明文字,但是已经学会了依靠神话传说来传播和传承文化。与蚕有关的神话非常多,比较著名的有“伏羲化蚕”、“嫫祖始蚕”,以及江南地区的“蚕花娘娘”等。“嫫祖始蚕”较符合神,“蚕花娘娘”则更接近于仙。这些神话传说,表现出了精神层面的蚕文化。然而,在这一时期的蚕文化中,非物质文化部分的制度层面还没有显现。

养蚕是随着农耕文化出现的,斯塔夫里阿诺斯认为,人类从狩猎、采集转向农业的原因是因为人口压力<sup>[5]</sup>。根据这个逻辑,蚕被驯化是用来满足人类的需要。另外,还有考古证据表明,那时的人们先是吃蚕,后来才发现蚕丝也可以利用<sup>[6]</sup>。吃饱穿暖是人类的基本生存权,即使是这样最简

单、最基本的需求的满足,也可以看出人类开始利用自然,只是这种利用程度非常低。

由此,在蚕文化萌芽时期,人面对自然,呈现出敬畏自然的生态伦理观。虽然人们驯化了蚕,但是人们还是创造出“蚕神”、“蚕仙”之类的神话传说,相信是因为神灵的存在,将蚕赐予他们,蚕才会出现;因为神灵的保佑,他们才能将蚕养好。那时的社会形态不成熟,客观存在于人类的只有自然界,人们敬畏的神灵大多就是自然。虽然人们也对周围的自然界有所了解,但这些了解是经验性的,甚至是前人经验性的,所以他们并不能真正理解自然界。敬畏之下,对于自然界,人类依赖它,没有意识去破坏它。笔者认为正是因为敬畏且喜爱神话传说中的“蚕神”、“蚕仙”,那时的人们才会将各种各样的蚕元素绘在日常生活中的器皿上。除了对自然的敬畏之外,强大的自然,也使得当时弱小的人类没有能力破坏自然,也就没有资格谈论保护环境、尊重自然的话题。总的来说,蚕文化萌芽时期的人们生来对自然心存敬畏,被迫与自然和谐相处,形成了一种敬畏自然的生态伦理观。

#### (二) 蚕文化发展时期中的生态伦理观

蚕文化的迅速发展主要对应蚕文化的生长期和鼎盛期。之所以将这两个时期合并为一个时期来进行讨论,主要是因为,虽然这两个时期的蚕文化在各个层面都发展很快,但是由于人类自身和科技的限制,相对于别的时期,其蕴含的生态伦理观非常相似。

将蚕文化发展时期物质层面的表现稍作归纳,可包括专门史书典籍的增多、植桑养蚕技术的提高、各种制作绢丝工具的创造(区别于磨制的石头、木棍、骨头)、丝绸生产与管理机构的出现、丝绸制品的精美化与多样化、“丝绸之路”的贯通等。从物质层面的发展中可以看出,在蚕文化发展时期,人对于自己利用自然的信心增强。

蚕文化发展时期中的非物质文化形态相比萌芽时期更加清晰。制度层面的非物质文化,首先,表现在生产和管理机构的出现上,因为机构是制度文化形成的基础;其次,祭祀蚕神的民间风俗制度化后得以传承;最后,以封建等级制度为基础的丝绸服饰等级日益得到强化。文化制度层面的成熟能够反映出社会的成熟,蚕文化发展过程中,社会从奴隶社会演变为封建社会。那时,人们便开始将管理社会,而非服从自然,作为核心任务。特

别是处于封建社会上层的群体,将对国家的控制作为其家族延存的核心,这展示出了人对自然态度的极大变化。

在蚕文化发展时期,精神层面的非物质文化繁荣更为突出,表现在专业典籍、诗、词、书画等各种有关蚕文化记载的空前丰富。往后的时期再也没能创造出这么丰富多彩的精神层面的蚕文化。精神层面的文化创造大多体现出人们对于自身所处环境的体悟,是对环境更深层次的了解。

为具体展现这一时期蚕文化的丰富,从《桑蚕丝绸史话》中挑选了一些记载内容,作为进一步分析的资料。晚唐诗人张籍《桂州》一诗中的“有地多生桂,无时不养蚕”,说的是多化性蚕。后魏的农学名著《齐民要术》总结和记述桑树压条繁殖法,记载了许多桑树品种。魏晋杨泉在《蚕赋》中,简明扼要地阐述了饲蚕的全过程和几个重要环节,并强调了蚕室的朝向、通风条件。到了唐代,元稹的《织妇词》中“东家头白双女儿,为解挑纹嫁不得”反映出了家织造户的苦状<sup>[6]</sup>。这些文字的写作内容、角度和目的虽不同,但都反映出了蚕文化各个层面的繁荣,展现出了人类对自然越来越深入地了解,越来越自如地利用。

由此,蚕文化发展时期,人们形成了一种利用自然的生态伦理观。这里“利用”这个词含有以人类利益为基础而使用自然资源的意味,人类的主观性开始突显。不过,这一时期继续传承着许多与祭祀蚕神有关的民间风俗,保留着对自然的敬畏之心。这与“文化堕距”理论相符,该理论认为由相互依赖的各部分组成的文化在发生变迁时,各部分变迁的速度不一致,一般来说,总是“物质文化”先于“非物质文化”发生变迁<sup>[7]</sup>。在蚕文化发展过程中,物质文化先于非物质文化发生变迁,绢丝工具的创造、丝绸生产与管理机构的出现等并没有从根本上动摇人们敬畏自然的观念。由此,产生了“文化堕距”。但蚕文化的确发生了变迁,因为“物质文化”变迁是一种文化变迁的先导。根据蚕文化物质文化的变迁内容可以看出,人们不再那么“自卑”,终会形成一种敢于利用自然的生态伦理观。不过,人类由于自身能力的限制,对自然生态的控制力仍较有限,所以“利用”一词不带贬义成分,人与自然仍旧和谐相处。

### (三) 蚕文化变迁时期中的生态伦理观

蚕文化变迁时期具体可分为两个时期,一是国内动乱变迁期,即由于国内动乱引发变迁的时

期;二是列强侵略变迁期,即由于列强侵略引发变迁的时期。列强侵略时期又以1931年的“九·一八”事变为界限,分为早期和晚期。笔者这里主要分析早期,因为晚期的蚕文化随着蚕丝业遭受列强破坏而几乎中断。

国内动乱变迁期导致蚕文化的南盛北衰,南方蚕文化的兴盛不可谓不是一种蚕文化发展的表现,“清代贵州桑蚕业在遵义地区的兴起”这一案例就可以说明蚕文化南下之深入。贵州由于交通闭塞,民族成分复杂,基本没有蚕丝业,丝绸布匹依赖外部输入,贵州每年要用大量财务换取,致使经济困难加重。乾隆初年(1736年),清王朝用武力开辟“苗疆”,百业凋敝,民生困苦,统治阶级与人民的矛盾变得更加尖锐,统治者开始意识到必须加强抚恤。在这样的经济和政治背景下,贵州涌现出了一大批贤能的地方官,山东历城人陈玉璠便是其中最早深入贵州的一位<sup>[8]</sup>。

陈玉璠出任遵义后千方百计寻求富民之路,乾隆四年(1739年),他派人到山东历城购买山蚕种,因路途遥远,茧种运到湘西,蛹已出茧,引种失败。第二次引种,因为贵州自然气候、农民操作不当等原因,也告失败。但他没有放弃,再次引种,取得成功。陈玉璠在公务之余,给民众讲授蚕带来的经济效用,也亲自传授养蚕知识和流程。乾隆八年(1743年),民间收茧达到800万粒,并培养出了大量掌握专业养蚕、织丝知识和技能的人才。不到10年,柞蚕山场也发展到“百余所”<sup>[9]</sup>。乾隆八年底,陈玉璠离任,民众蜂拥相送,后来在城内及尚稽、苟江等地建立生祠对其奉祭。养蚕的农户,也在家中设立牌位,把他当作蚕神一样供奉<sup>[6]</sup>。

随着贤能官员的陆续到来,遵义地区的从野蚕到柞蚕业,再向桑蚕业发展,创造出“遵义府绸”,可与四川锦缎、江苏凌绸、湖绉、杭纺比美,与吴菱蜀锦争价,而且远销南洋、西域,在国际市场上也占有一席之地<sup>[10]</sup>。

蚕文化在变迁时期,其物质和精神层面的文化形态得到进一步发展:种桑养蚕织丝技术、工具和知识教育普及的专业化;从奉祭神灵到奉祭官员,民间风俗的明显变化;丝绸种类的丰富等。蚕文化制度层面的变化在这一案例中没有明确提到,但是远销国际这一事实,或许能够说明当时的丝绸并不只是贵族专用,而成了民间贸易商品的一种,嵌入丝绸服饰中的严格等级制度已出现松动。



这些变化都体现出人对自然态度的变化,自然在人们的眼中不再难以捉摸,关于自然的知识是可以掌握和教学的。“科学”二字在这一时期的蚕丝业中也由此得到明确体现,人们完全有能力在适应自然规律的前提下改造自然环境。遵义地区从野蚕到柞蚕业,再到桑蚕业的发展过程中,柞树会得到大规模种植,而后桑树又会代替柞树得到大规模的种植。植被的不断改造,不仅没有破坏遵义地区的自然环境,还使得当地桑蚕经济高效发展,可谓一举两得。该过程更直观地体现出,人们面对自然的態度从低程度的利用,变为良性改造,“人类中心主义”的生态伦理观由此开始显现。

所谓“人类中心主义”的生态伦理观,即“以人类为中心”的生态伦理观,是指人类的利益和需要是评价人与自然关系的根本尺度,保护自然、维护生态平衡从根本上是保护人类的利益和价值<sup>[11]</sup>。这一案例中蚕文化发展含有一个因果逻辑:出于经济和政治方面的需要,蚕丝业需要科学推广,在科学推广之下,蚕丝业的推广速度才能加快,推广范围才能扩大,蚕丝品质才能提高。从这一逻辑中可以看出,人们已将自身发展作为衡量尺度,去调整自身与自然的关系,良性改造自然环境,发展社会经济。

#### (四) 现阶段蚕文化中的生态伦理观

对于现阶段蚕文化,笔者选择改革开放后的蚕文化作为分析重点,因为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这段岁月非常动荡,蚕文化的恢复是这一时期的主要任务。而这一时段的蚕文化主要以民间风俗部分的恢复为主,不涉及蕴含其中的生态伦理观的较大改变。

现阶段蚕文化形态保存完好,并不是只能借助文字、书画等才能了解的知识,而是真实生产实践活动的过程和产物,自然环境的生产力依然是关键。因此,现阶段在注重保护蚕文化衍生出来的诗词歌赋和绘画,及其传承下来的蚕乡原生态生产技艺和娱乐形式的同时,还应重视保护其所依赖的生态环境。

在蚕文化的物质层面,现阶段出现的最为引人注目的变化便是桑蚕循环经济示范基地的出现,这种基地富集了有关现阶段蚕文化物质层面的发展。例如广西河池桑蚕业循环经济示范基地,该基地拥有丰富的优良桑树品种:特优2号、粤桑11号、桂桑优62、“两广二号”等;还有优良

的蚕种:桂蚕一号、桂蚕二号等,这是该基地的基础性优势。该基地还掌握着关键的技术优势:桑树生产栽培技术、环保技术、桑蚕病虫害防治技术、蚕茧丝加工技术等,以及技术开展必须配套的相应设施。这些优势的存在,使得该基地从2005年到2010年,蚕茧产量连续6年稳居全国首位<sup>[12]</sup>。由此,蚕文化物质层面发展出了明显的规模性、系统性和科学性。

这一时期蚕文化的非物质文化方面,也随着物质文化的发展而发展。精神层面的发展有四个方面:一是,相关书籍和视频内容中,突出具体技术上对环境的保护,如农药的使用、桑蚕的消毒、病蚕的处理等。二是,部分高校将桑蚕技术设为专业,使桑蚕业科学理论化程度大大提高。且高校中培养的人才,更容易接受“发展经济要以保护环境为前提”这一观念。三是,民间相关风俗的变化。祭祀蚕神的风俗仍然存在,但形式集中化、简约化,数量和种类都大大减少。四是,由于城市化和工业化的冲击,传统文化消亡速度加快,因此更加重视对传统蚕文化中优秀部分的保护。

现阶段蚕文化制度层面的变化较为剧烈,其等级制度早已消亡。随着我国阶级概念的淡化,衣着面料的选择凭的是个人的兴趣爱好和经济能力,而不是凭借先天身份或社会地位,也不受到任何机构的管制。因此,丝绸制品的需求日益旺盛,其流通范围也大大拓宽。

可见,在现阶段环境问题日益严重的大背景下,人们明确意识到自己拥有破坏自然的巨大力量,且已经伤害到了自身的利益。因此,在物质层面,技术的改进、设备的使用等都竭力考虑环保因素。在精神层面,强调提高人们在种桑养蚕缫丝过程中的环保意识,不断发掘传统蚕文化中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观念。在制度方面,由于丝绸服装中制度的消失,丝绸制品生产、管理、流通等环节的自由化,使得丝绸生产更加开放,更有利于科技的吸纳,以提高丝绸生产过程中的效率和环保能力。

当然,现阶段蚕文化的变化不只上文所述,但从各层面的变化已经可以看出,现阶段蚕文化中蕴含的生态伦理观,将变迁期所体现的生态伦理观进行了明确和强化,将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观念渗透到了各个层面。经济效益与保护环境并重,使得“人类中心主义”的生态伦理观在蚕文化中更加成熟。

#### 四、结论

蚕文化发展到现阶段,经历了漫长的过程,蕴含其中的生态伦理观也从敬畏自然、利用自然、良性改造自然等观念,发展到如今较为成熟的“人类中心主义”的生态伦理观。生态伦理观的这一成长过程,并不是后一时期的观念抛弃前一时期的观念来进行的,而是在前一时期的观念基础上,后一时期的观念才得以形成。利用与良性改造自不必说,如今像送“蚕花娘娘”这一风俗在浙北蚕乡每年都会隆重举行,这便是“敬畏”的传承。于是,现阶段蚕文化中蕴含的生态伦理观就包含了人类对自然的敬畏、利用与良性改造的观念。

根据文中的分析,人们敬畏自然、利用自然和良性改造自然时,都能与自然和谐相处。且许多学者一致认为,立足于“人类中心主义”的生态伦理观并不是要把人与自然对立起来,对自然进行无限制掠夺,而是在认识到人对自然的依赖关系的基础上不断协调人与自然的关系,寻求实现人与自然的协调发展的可持续发展之路<sup>[11]</sup>。由此,现阶段蚕文化中蕴含的“人类中心主义”的生态伦理观是一种良好的生态伦理观。

然而,有部分学者还是对“人类中心主义”的生态伦理观进行了批判,认为这一观念存在物种歧视等不良因素<sup>[13]</sup>，“自然中心主义”的生态伦理观才是人类社会的终极关怀。所谓“自然中心主义”的生态伦理观,是指完全抛开人类生存利益的尺度,将保持自然生态系统的“完整、稳定和美丽”作为人类行为的终极目的和人对自然的道德行为的终极尺度<sup>[14]</sup>。可见,该生态伦理观具有一定理想性。在我国,现阶段推行“人类中心主义”的生态伦理观已是十分不易,如此理想的生态伦理观必定无法推行。因此,蚕文化中蕴含的“人类中心主义”的生态伦理观便是一种适合引

导生态文明建设的观念,有助于推进当前我国生态文明建设。

#### 参考文献:

- [1] 李树人,阎志,侯桂英. 中国古代的生态伦理观[J]. 河南农业大学学报,2000,34(04):358.
- [2] 李琴生. 中国丝绸与文化[M]. 北京:团结出版社,1991:20.
- [3] 金佩华. 中国蚕文化论纲[J]. 蚕桑通报,2007,38(04):5-6.
- [4] 田阡. 文化生态学视角下的中国蚕文化及其保护[J]. 中国蚕业,2011(02):81.
- [5] 斯塔夫里阿诺斯. 全球通史(上)(2版)[M]. 吴象婴等,译.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25.
- [6] 刘克祥. 蚕桑丝绸史话[M].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15.
- [7] 郑杭生. 社会学概论新修[M].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68.
- [8] 柏威,李红伦. 清代贵州桑蚕业发展对经济的影响——以遵义地区为主要研究对象[J]. 黔南民族师范学院学报,2017,37(01):91.
- [9] 黄家服,段志洪. 中国地方志集成. 贵州府县志辑[G]. 成都:巴蜀书社出版,2006:347-348.
- [10] 石永言. 历史文化名城遵义[M]. 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84:123.
- [11] 倪洪涛. 人类中心主义的生态伦理观——兼评非人类中心主义的生态伦理观[J]. 教育前沿,2006(04):13.
- [12] 孙维峰. 河池桑蚕业循环经济示范基地建设研究[J]. 合作经济与科技,2011(15):24.
- [13] 南海. 对人与自然的关系和人与人的关系的哲学思考[J]. 科学技术与辩证法,2002,19(03):3.
- [14] 刘福森. 自然中心主义生态伦理观的理论困境[J]. 中国社会科学,1997(03):45.

[责任编辑:刘大泯]